"知人则哲"

——读《和珅评传》

高　翔

冯佐哲先生的新著《和珅评传》最近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在清史学界，说佐哲先生是建国以来和珅研究的开拓者，是当之无愧的。早在三十多年前，他就编写了《和珅长编初稿》，八十年代末，又出版了《贪污之王——和珅秘史》，这大概是史学界关于和珅的第一部比较系统的传记著作。此后，他又在《和珅秘史》基础上，增加章节，补充资料，修订行文，完成了近三十万字的学术专著《和珅评传》，从而将和珅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大作问世，佐哲先生即向学界同仁征求意见，以为修订再版之基础，甚至对后生晚辈，他也坦言甘苦，乐闻异议。余观佐哲先生为学，其志专，故能锲而不舍；治学勤，故能德业日进；无矫情，故能直抒己见，不囿陈说；不自负，故能博采群言，折衷公当。以此为学，何学不成？无怪乎《和珅评传》终成学术界研究和珅以及乾隆后期政治的一部最新力作。

一

自八十年代以来，人物研究一直是清史研究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学术界的研究重点一般都集中在皇帝身上（以传记而言，有清一代共十二位皇帝，每一个都拥有厚厚的传记著作。有的皇帝，甚至有四五部传记，如果再加上各种类型的皇帝研究专著，成果就更为繁复。就数量而言，我们可以说在众多清代人物中，能和皇帝研究媲美的，大概只有对曹雪芹，以及近代曾国藩、李鸿章诸公的探讨了），而很少注意到对辅政诸臣的深入考察。这种局面在客观上导致了两个明显弊端：一是限制了皇帝研究的深入性和全面性。虽然在清代，皇权高度发展，所谓"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①]，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我们换个角度考察问题就会发现：专制皇帝所期望的理想化君权在历史上从未出现，皇权强化在任何时候都具有显而易见的局限性，并出现各种异化现象。原因很简单：权力越集中，皇权越扩张，受皇帝亲信的极少数大臣的权力也会随之加重，进而出现新的专擅行为，而这往往是专制君主始料不及的。像明代废除丞相，但权阉之弊却愈演愈烈，清雍正帝躬亲庶政，"日理万机"，但及其晚年，鄂张门户已悄然而成，不久，即酿成新的党争。乾隆皇帝将君主独裁奉为"家法"，宣称："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康熙）皇考（雍正）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未旁假。即左右亲信大臣，亦未有能荣辱人，能生死人者，盖与其权移于下，而作威作福，肆行无忌，何若操之自上。而当宽而宽，当严而严？此朕所恪守前规，不敢稍懈者。"[②]但在具体实践中仍难如愿，其统治中期有于敏中的"金坛秉政"，后期更有和珅之"蒙蔽专擅"。可见，皇权加强并不意味着学者对臣僚之政治影响可以忽略不计，相反，皇权愈是高度集中，学者愈应重视对其亲信大臣，尤其是所谓"首辅"的重视和

研究。否则，单就皇帝论皇帝，不但有可能被一些历史假象所迷惑，而且还可能会影响到对某些重大问题的认识。清前期历史人物研究的最大缺陷是：人们把过多的精力用于皇帝身上，而不恰当地忽略了对同时代其他人物的考察，特别是对笼罩在皇帝阴影下的辅政诸臣，如熊赐履、马齐、张廷玉、傅恒，以及稍后的王杰、曹振镛等人的研究，对辅政诸臣的事迹不清楚，就不可能准确地解释皇帝的许多政策和决策，以及有关的思想、性格和爱好，也不利于人们弄清皇帝在清廷行政运作中的真正地位和作用；二是皇帝研究，特别是一些皇帝传记著作，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对皇帝生平事迹的描述反映一个时代，但由于相关专题研究，特别是人物研究不够深入，往往容易产生偏而不全之毛病。而历史上，皇帝确实代表着一个时代，但并不等于一个时代，史学家要真正把握时代的发展脉络，其首要前提是对该时代的一切重要方面，特别是对所有关键人物有一个清醒而准确的认识，通过 人物研究认识时代变迁，这大概就是所谓“知人论世”吧。人物研究的片面性，必然影响到人们对时代性质判断的准确性，在这种情况下，佐哲先生的《和珅评传》可以说及时而很好地填补了一项学术空白。

和珅是乾隆后期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他在清朝“全盛”、“极盛”时期登上政治舞台，成为乾隆帝最为倚重的亲信大臣，不可一世，“廷寄前行，专署己衔姓。天下称伯相，从风尽靡。”[③]甚至在嘉庆帝亲政后，一些官僚对和珅的畏惧还超过了对新君的奉迎，嘉庆帝就曾指责山东巡抚伊江阿说：“平日不知有皇考，今日复不知有朕，惟知有和珅一人。”[④]然而，正是在和珅当政时，清朝开始了影响深远的盛衰之变，及和珅被诛，大清帝国已陷于萧条冷落的“嘉庆中衰”。因此，全面系统地考察和珅就成为分析清朝盛衰之变，研究十八世纪中国社会政治的关键环节之一。《和珅评传 》通过对和珅政治生涯的全面论述，对其家族背景、性格才学、政治活动的详细考察，比较真实地再现了十八世纪后期清朝上层政治的内幕，达到了知人论世的研究目的。

《和珅评传》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其最明显的特点是：它比较彻底地改变了以前将和珅漫画、丑化的传统做法，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还和珅以历史本来面目，并予以公正客观的评价。

大概从嘉庆帝亲政以后，中国社会中就出现了一种丑贬和珅的舆论趋势，近年来一些文艺作品或将和珅肆意漫画，或将其与历史上一些不学无术之佞臣相提并论，这种脱离历史实际的庸俗创作不但歪曲了和珅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它直接影响到了人们对乾隆帝及其时代的正确认识。应该说，在乾隆中后期，尽管清朝政治腐败日益加剧，国力开始走向衰微，各种矛盾趋于激化，但大清帝国的统治还是巩固的，清廷仍然比较成功地维护和加强了国家的统一和独立，中国社会经济仍在持续向前发展。作为深受皇帝信重的辅政大臣和珅对稳定当时的局势或多或少，自觉或不自觉地作出了一些贡献。他是贪官，但不是庸臣；他是权奸，而非单纯之佞幸。当时来华的英国使团成员对此颇有觉察，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说：“和中堂的态度和蔼可亲，对问题的认识尖锐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他的飞跃上升，固然是由于皇帝的特别提拔，这种情况在许多帝国是相同的，但他同时也要得到当朝有势力的统治阶层的一致赞许才能长期保得住这个崇高的职位。”[⑤]嘉庆帝也承认和珅，“精明敏捷，原有微劳足录，是以皇考高宗纯皇帝加以厚恩。”[⑥]《和珅评传》在基于大量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对和珅功过是非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作者说：“分析和珅的一生，他是一个应该否定和鞭笞的人物，他对历史的发展没有起到多大的促进作用。在他当政期间，人民的生活更

加困苦，不得不走上反抗的道路。乾隆末年，一起又一起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事接连发生，最后终于爆发了历时10年、波及五省的白莲教大起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和珅的出现及其历史实践，加快了清朝由盛转衰的进程”（《和珅评传》第338页）。与此同时，作者又指出：“如同世间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一样，分析一个人也应该一分为二。和珅并不是生来就那么坏，也不像有些人所描绘的，他是一个家境贫微，地位下贱而且不学无术，不文不武，只知捞钱的草包。应该说，和珅是一个聪明绝顶，思维敏捷，办事干练，有才能，会办事的大能人。”作者认为和珅有良好的知识素养，为政不墨守成规，具有敛财、理财和“生财”的本事，在处理少数民族和中央政权的关系上，在处理外交事务上都有政绩可言。作者特别指出：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负责具体操办此事的和珅之表现总的说来是得体的：

“在英国使团整个访华期间，不论在承德避暑山庄，还是在北京的各次会谈中，和珅都施展了他老练的外交才干，既彬彬有礼，又不放弃原则，软中带硬地拒绝了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提出的要求中国给英国人划一居留地，增开港口与增加贸易额，开放内河，少纳税金，以及允许英国使节常驻北京等无理要求，从而维护了中国领土的完整和主权的尊严。这是应该加以肯定的。这里也应该指出：我们肯定乾隆帝和珅等人维护祖国统一、独立与领土完整的正义主张，但也不赞成他们坚持闭关自守、封闭锁国的对外政策。”（《和珅评传》第344页）。

在分析和珅其人时，作者还注意到和珅虽身居要职，“但他不大顾忌传统观念，公开从事工商业活动，以牟取高额利润和进行超经济剥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也许是晚清李鸿章、张之洞与左宗棠等一伙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前身或影子。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今后研讨的。”（《和珅评传》第345页）

此外，作者对和珅曾经做过的一些利民之事，也做了如实的叙述，如乾隆五十二年京城米价昂贵，和珅严禁铺户囤积居奇，并将查出之粮食减价出售，或设粥厂赈济贫民等。

应该说，冯佐哲先生对和珅的描绘是生动的，对和珅性格、才干、功过是非的评价是公允的，体现了一种求实的学风和辩证的历史观。人的个性、思想、情感是复杂多变的，而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更为人们准确认识历史人物增加了无数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科学的理论思维，是不可能作出开创性成果的。如果说历史运动是辩证的，那么，衡量历史人物更需要辩证法。

二

平日常听一些前辈学者畅谈近现代史学之变迁，指点治学迷津。环顾当代史坛，窃以为仍有汉宋之别。所谓宋者，往往空谈“义理”，或以一偏之见为理，或以望文生义为理，或以自逞胸臆、杜撰“体系”为理，或以拾洋人权威牙惠为理，总未脱离晚明姚江末流游谈无根的空疏学风；所谓汉者，以堆砌资料为博，以叠床架屋为精，拾芝麻以为巩珠，袭陈言而自诩多闻，以偏概全，见小遗大，总未脱离乾嘉学术繁冗刻板之流弊。真正能像覃溪、东原那样言考订必以“衷于义理为归”，穷义理必由故训以明者，可谓凤毛麟角[7]。冯佐哲先生《和珅评传》坚持辩证史观，知人论世，在理论上较前人有关和珅之论述高明何止以道里计！更重要的是，佐哲先生绝不空谈理论，而是将自己的观点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之上，

从而使该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在当今清史学界，研究和珅时间最长，搜集资料最富者，非佐哲先生莫属。一部《和珅评传》所用资料包括清朝档案、文集、《实录》、野史，以及国外文献记载，等等，可谓内容浩瀚。作者根据这些资料，对长期存在的有关和珅的重要疑点进行了严密的考证和分析，对一些重要学术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旗籍问题。和珅系满洲正红旗人，官书、正史均有明确记载，本来不成历史问题。但民国以来，一些学者捕风捉影，特别是个别红学家因不谙清朝典制，遂怀疑和珅为正白旗内务府包衣。《和珅评传》根据翔实可靠的资料，比较彻底地否定了这种推测，完满地解决了和珅的旗籍、出身、家世以及青少年时期的主要活动等问题。

2. 和珅与乾隆帝的关系问题。和珅在乾隆后期备受宠信的原因，是史学界和民间长期关注的问题，说法各异，众说纷纭。《和珅评传》对此给予了比较全面的解释。作者认为：和珅获宠，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第一，和珅出身八旗满洲之家。清朝，尤其是在清朝前期，满族人受到皇帝的特殊恩遇、信任。虽然朝臣中从中央到地方机构，均设置汉官，但历来以满官为主导，汉官为次，大权掌握在满人手中。这一点，畛域分明，绝不含糊。""其次，和珅聪明能干，办事干练，善于领会皇上的意图。""第三是因为和珅年富力强，知识、能力均超出其他满族人的同辈。"（《和珅评传》第48页）。但作者同时也指出，和珅获宠，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长相漂亮，口齿伶俐。作者认为，民间传说的和珅与乾隆帝的同性恋关系，是可能的。乾隆帝用人，本来就注意臣僚的外貌如何，和珅才干长相兼备，受宠发迹也就不难理解。需要说明的是，和珅与乾隆帝的同性恋关系，在当时是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的。像御史钱沣就曾指责和珅办公地点"相近寝禁"，"不应于未辨色之先，一大臣入止，而随从军机司员亦更入更出。"⑧虽然不少学者对此都有觉察，但一般在著作中不作专门介绍和分析，《和珅评传》在这方面的论述，可以说是一大突破。附带提及，好男风在中国传统社会是长期存在的，虽谈不上是一种雅事，但也不足为耻。与乾隆帝以及和珅同时代的袁枚、郑板桥均乐此不倦，并将其载于诗话和文集，津津乐道。史学探讨没有禁区，当有一天史学家们将这些不足"为外人道"的领域真正探讨清楚了，他们对历史人物的认识也就会深化许多。

3. 和珅的家产数额问题。这可以说是困扰史学界多年的一个老问题。自从和珅被诛以来，社会上就流行着关于其巨额家产的种种传说，甚至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谣。尽管关于和珅家产的记载矛盾百出，但学术界大多采用八亿两白银之说，所谓"整个家产折合白银八亿两之多。而当时清朝一年的财政收入才四千多万两。和珅一人的财产就相当于朝廷二十年的总收入，这确是非常惊人的。"⑨《和珅评传》通过对各种家产记载的排比分析，较好地解决了和珅家产数额问题。佐哲先生在这里的重要贡献是，他比较充分地证明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和珅犯罪全案档》，实际上并不是一份正式档案，它的文字不是原办案机构整理编纂的，而是后人汇集草成。"有种种迹象可以说明，《全案档》最早的材料来源是宫内太监或好事者从邸报、小钞或人们传闻口碑中转抄、记录下来的。其中有真有假，许多数字是经过渲染、夸大的。后来又在市井流传中添枝加叶，尤其是对和珅家产的无限膨胀、夸大，至道光年后才汇集成册，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和珅评传》第312页）我认为，佐哲先生对《和珅犯罪全案档》的分析颇具说服力，今后史学界对这一材料的引用要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关于家产数额，《和珅评传》根据《清实录》及其他正史、档案的记载

判断，认为和珅除了珍藏的大量稀世宝物、古玩和字画外，能够估价的现金、土地、房屋等，“当在一二千万两之谱。”（《和珅评传》第301页）应该说这一估计比较符合历史实际。在明清专制政体下，臣僚个人财富相当于朝廷一二十年财政收入，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何况乾隆帝并非昏君，和珅的权力还受到阿桂、王杰等人的制约。

4. 和珅财富来源问题。传统清史著作在论及和珅财富问题时，一般有两个特点，一是感叹其财富之巨，二是将这笔财富一概归之贪污。《和珅评传》摆脱了这种公式化的描述方式，将和珅财富问题作为一个学术问题予以探讨，并对其敛财方法和途径作了专门分析。作者认为：窃取、纳贿、营私是和珅敛财的主要方法，而就其财源，主要有：兼并土地、收取高额地租；出租房屋；放高利贷，从事典当业，获取暴利；经营多种工商业，赚取巨额利润。我认为佐哲先生对和珅财源的分析值得治清代政治史者高度重视。他提醒我们：将和珅财富完全归结于贪污是简单化了，也不足以服和珅之心。十八世纪，清朝皇帝以及不少官僚都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通过高利贷、典当业等方式牟取暴利，和珅则是其重要的代表人物。虽然和珅的特殊政治地位使他不可能和一般工商业者平等竞争，但这部分收入和贪污所得毕竟具有质的差异，学术界应该设法搞清这笔收入在其家产中所占比重。另外，从和珅对高利贷、工商业的经营中，我们也许可以看到当时官僚集团价值观念的某种变化。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以外，《和珅评传》对和珅的政治手段，与嘉庆皇帝的关系，生活与情趣等多方面都作了非常生动、详细的分析与叙述，比较全面地揭示了和珅细腻的感情、复杂的性格和贪鄙的行政作风。

三

在反复阅读《和珅评传》以后，我认为，这是近年来清代人物研究中少有的成功之作，作者对和珅的分析全面而不失重点，行文平实而富文彩，在研究方法上，该书将和珅置于康乾盛世特殊历史环境中予以考察，与此同时，又通过对其政治活动的追述，深入浅出地指出和珅对大清帝国前途与命运的独特影响，比较恰当地处理了个人与社会和历史的关系。

当然，和任何学术著作一样，《和珅评传》也难免具有自己的局限性。我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尚需作者作进一步推敲和完善：

一是对清代，特别是乾隆时期贪污之风盛行的社会原因，应作更加深入 的考察。作者认为和珅是乾隆时期贪污网的总根子（《和珅评传》第154页），这有一定道理。但我认为，用贪污网以及总根子来概括乾隆中后期贪污状况未必准确。和珅虽有亲信，但广大臣僚和他并没有形成政治上严格的依附关系，绝大多数人对和珅的行贿与奉承实际上是出于不得已之苦衷。乾隆中后期贪污愈演愈烈，原因十分复杂，在和珅当政以前，贪污就已经非常盛行，和珅的责任是：因其肆无忌惮的营私舞弊而大大加重了清朝政治的腐败程度。对贪污，乾隆帝自己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大量收受贡品。嘉庆帝尝云：“外省备进贡物，名为奉上，其实藉以营私。每次未收之件，既可分馈权要，又可归入私囊，而属员等竞事奉迎，则以帮贡为名，借端派累，层层巧取，以致小民朘削难堪。大抵进奉一节，最为吏治之害，此联深悉弊端而必加严禁者也。”[⑩]），此外，十八世纪中后期奢侈之风的盛行，物价的急剧上涨，官僚待遇始终未得到及时而有效的调整等，都或多或少地加剧了贪污现象。

二是关于和珅与《红楼梦》删改流行的关系，作者基本上采用了周汝昌的说法，认为和

珅曾阅读《红楼梦》，并请人删改“碍语”，增补后四十回，然后呈送乾隆帝，在得其首肯后，《红楼梦》方开始流传于大江南北。这一说法的重要依据是赵烈文笔记转引宋翔凤之言：“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末年，和珅以呈上，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为明珠家作也。”应该说，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和珅与《红楼梦》关系的分析，仍主要建立在推测和传说基础上，在没有找到可靠的第一手材料以前，最好对此存疑。

三是对和珅与乾隆中后期文治建设的关系，仍嫌论述不足。作者指出和珅曾利用编修《四库全书》打击不愿与他合作或他所衔恨的编纂者，但并没有加以专门论述。和珅个人的学术倾向，他和当时学术界领袖人物之交往，知识精英（如袁枚等人）对他的看法等，在书中均尚有进一步介绍和探讨的余地。

当然，上面几点只是笔者的粗浅建议。总的说来，《和珅评传》是一部见功力、有理论的上乘之作。昔人谓“知人则哲，能官人”⑪，我大胆将其演绎到人物研究，云：知人则哲，持论则平。佐哲先生庶几乎！佐哲先生告诉我，《和珅评传》将修订再版，我期待着，同时也坚信，修订后的《和珅评传》必将是一部更加严谨、更加精深的史学专著，学术研究从来都是一步步探索，一步步积累，一步步走向完善，何况佐哲先生这样资深而勤奋的专家！

---

①《清代三朝史案》下册：《尹嘉铨为父请谥并从祀文庙案》。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93 年版。

②《清高宗实录》卷 323，乾隆十三年八月辛亥。

③侯官古灵后人《清外史》第 116 页。

④《嘉庆起居注》嘉庆四年正月十三日。

⑤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 363 页。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

⑥《清史列传》卷 35：和珅。

⑦关于覃溪、东原之治学方法，可参见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 7：《考订论》，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 35：《戴东原先生事略状》。

⑧梁章钜：《枢桓记略》卷 22：钱沣《奏请军机大臣进止仍循旧章折子》。

⑨郑天挺主编《清史》上编：第 462—463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⑩《清仁宗实录》卷 37：嘉庆四年八月丙申。

⑪《尚书·皋陶谟》。

（作者高翔：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邮编 100732）